

李长文著

微笑与悲剧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微笑与悲剧

李长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7年·沈阳



作者简介

李长文，一九四一年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农村。一九五八年参加工作，当过工人、战士、报道员，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。毕业后分配到辽宁日报当记者，现任辽宁日报记者部副主任，兼任文汇报特约记者。

一九六〇年开始写作，二十几年来，发表过一些杂文、评论、报告文学、小说和较多数量的新闻、通讯，曾获一九八五年辽宁省优秀新闻奖。

报告文学《长城的奉献》获一九八六年省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奖，报告文学《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》获一九八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中国青年报“火凤凰杯”征文奖。

目 录

苦 辣 酸 甜

不是一个人的悲剧.....	(3)
“杨帅儿”的微笑.....	(18)
含泪的期待.....	(41)
石峰上书.....	(51)
战斗在“生命线”上.....	(59)
令人钦敬的抉择.....	(73)
“宝山”用权记.....	(79)

酸 甜 苦 辣

党和人民自有公断.....	(89)
海的儿子.....	(98)
“木柴”之光.....	(116)
接班者的风姿.....	(127)
微笑的心灵.....	(137)
“四等”冠军.....	(149)
明亮的生命之火.....	(155)
当你举杯祝酒的时候.....	(159)
耿大胡子.....	(166)

“清明树”与马蹄莲.....	(178)
贤哉，夫人！.....	(188)
路，应该这样行.....	(196)

脊梁与蛀虫

“长城”的奉献.....	(207)
“中国姑娘”在辽宁.....	(228)
当大堤决口的时候.....	(250)
卫士雄风.....	(258)
失“魂”落“魄”者的悲剧.....	(267)
“书报大王”被杀案余话.....	(278)
走向深渊.....	(289)

艺苑撷英

访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.....	(295)
做一个蓝色的梦.....	(304)
访包桂芳和她的声乐小组.....	(309)
为农民写一辈子戏.....	(313)
访“临时工”剧团.....	(317)

甜 酸 辣 苦



不是一个人的悲剧

——青年农民万元户杨智玉破产自戕的思考

马克思说过，实现商品的价值，是惊险的跳跃，这个跳跃，如果不成功，摔坏的不是商品，但一定是商品的所有者。

一千三百万分之一

提起清原县甘井子乡二道河子村的青年农民杨智玉，恐怕许多读者至今还会记忆犹新地说：“晓得，不就是寒冬腊月从深圳用飞机千里运鸭，轰动了全国的那个乡下小伙子吗？”

是的，岁月飘忽，斗转星移，如今，这位“请‘狄高’鸭坐飞机”的年轻人，情况怎样了呢？

请读读两组截然相反的数字：

——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杨智玉第一次从深圳购“狄高”鸭五百余只，并租用民航飞机和三架军用直升飞机，将鸭子运到清原家里。仅一周时间，用十八元一只购进的“狄高”鸭，竟以每只一百二十元的高价，销售一空，盈利一万七千九百元。

——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，清原火车站杨智玉第二次去深圳购“狄高”鸭三千只，由于种种原因，鸭价骤跌，亏损惊人，竟欠债二万七千九百多元！

他，破产了！

请看看两个截然相反的历史瞬间：

——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清原县二道河子村大华山脚下，青松添翠，白雪生辉，三架军用直升飞机，载着杨智玉和他购回的五百余只“狄高”鸭，缓缓落下。杨智玉着西装革履，戴太阳镜，满面春风，兀立于机舱门口。县、乡领导赶上去握手祝贺，二千多父老乡亲蜂拥而上，笑语迎人，鲜花扑面……

——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，晴空丽丽，骄阳灼灼。一列从通化驶来的客车，呼啸着向站内驰来，站在月台上的杨智玉，目光呆滞，神情迷惘。他狠劲地吸了最后一口烟，深情地向四周望了望，猛地向奔驰而来的列车扑去，一个悲惨的历史瞬间闪过人们的眼前……

他，自杀了！

从腰缠万贯到债台压身，从雄心勃勃到灰飞烟灭，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，岁月之神，只是眨了一下眼睛，这年轻的农民就从希望的峰巅，跌进毁灭的深谷。是历史的偶然，还是命运的不幸？

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即杨智玉死后一个月，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称：我国已有一千三百万农民经商，成为城乡流通领域中一支人数最多的生力军。杨智玉虽然离开了人世，但他曾是这一千三百万生力军中的一分子。他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克尽绵薄之力。历史将以他的成功、失败的

酸甜苦辣，昭示诸多的后来者。

胆 过 于 识

杨智玉第一次贩鸭得手，一夜之间，陡然大富，遐迩闻名。小汽车不绝于阗，亲朋故旧趋之若鹜。单是请他吃饭的人，就摆起了“长蛇阵”。待他第二次贩鸭失势，债台巍巍，眉头紧锁之时，车与人骤减，那“长蛇阵”，也早已销声匿迹了。一九八六年除夕，村里烟花怒放，鞭炮声声。杨家只能与清雪北风相谑。冷寞孤寂之中，杨智玉回首往事，心潮难平，慨然执管，写了六副楹联。其中有一联曰：“有胆有识，胆过于识”。这当然不是穷途之哭，这是他痛定思痛后的自我省察。

杨智玉有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。家里的活，她全包；地里的活，她照样全包。杨智玉几乎成了“闲”人。当然，也没全闲下来，他订了十五种报纸和九种杂志，可以给他打发掉一些时间。一天，他对妻子说：“照报上的说法，我现在叫‘剩余劳力’，咱不能光靠刨土拉疙瘩发财致富，得想想别的法子。”“想啥法子？”妻子问。“干商品生产。”

“啥？！”见一个大字不识的妻子发懵，杨智玉抖了抖手中的报纸说：“就是生产市场上需要的东西，来钱又快又多。这报上说了，一来个人可发家致富，二来还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做贡献呢！”看着妻子似懂非懂的样子，杨智玉打住了话头：“好了，给你说到晌午歪你也不一定懂，你把家里地里的活干好，就行了。”

杨智玉开始琢磨起“商品生产”来。他先是经营菜籽，

获利不大，后又经营“康贝尔”鸭，没赔没赚。一九八四年秋，他在《辽宁农民报》上，看到从澳大利亚引进“狄高”鸭，在东北三省被确认为优良品种的消息，禁不住眼前一亮，大腿一拍：“好，就干这个！”他当即筹措现款，将全乡以四五元一只从朝阳购进的几十只“狄高”鸭，用每只一百元的高价全部买下，自家垄断，搞独家经营。紧接着，他在吉林《红色社员报》上登出预售“狄高”鸭种雏种蛋的广告，签定供货合同一百多份，收取预定金七万元。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，杨智玉根据报上提供的信息，决定去深圳购鸭。行前，他几乎大半宿没合眼，到底想出个携带数万巨款的好法子：把四岁的小女儿带上，一来让孩子开开眼界，二来把那数万巨金，统统放在孩子装零食的小包里，让孩子背上，保准谁也不会注意。他想到去深圳那样的“洋”地方，狗皮帽子、对襟袄是不行的。便买了一身蓝色警服和一双胶皮靴换上。村里几个见过一点“世面”的青年一见他这身打扮，笑了：“人家深圳扫马路的，都不穿这个。”杨智玉一想，也有道理，于是咬咬牙买了双亮头皮鞋换上。到了深圳，孩子带钱这招还挺灵，没出啥闪失。可那身打扮却出了问题。几次叫出租车，司机连停都不停。他终于搞明白了，自己这身打扮虽然在山里是“最高标准”，可和深圳人的西服革履一比就太逊色了。他狠狠心买了一套港式西服，又买了一副太阳镜，这一打扮，还真灵验，一招手，出租车就过来了。可司机一问话又傻眼了：“有港币吗？”他只好如实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出租车“忽”地一下开走了。买鸭子得跑多少道，坐不上车多误事儿！他不得不要点山里人的“小聪明”了。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。司机照例

问：“有港币吗？”杨智玉连声说：“有，有。”待到了目的地，杨智玉一掏人民币，司机不高兴了：“要港币！”杨智玉赶紧拿出一支笔来：“这是两用的钢笔。”搞得司机哭笑不得。

为了抢时间以减少途中的损失，且不致错过鸭价的好势头，杨智玉大胆决策，不惜花数万租金，把购得的五百余只“狄高”鸭，请上了民航和部队飞机，迅速从深圳运回。应当说杨智玉这第一次运鸭，不失有胆有识之举，但从他贩鸭的全过程看，还是胆过于识的。比如，租不到飞机怎么办？用火车运，少则一月，多则数月，冰天雪地，千里迢迢，损失不堪设想。再比如，即便能顺利运回，由于意外原因，鸭价暴跌怎么办？那是要倾家荡产的。对这些潜在的不利因素，杨智玉缺少足够的“见识”，便大胆“出山”，他的成功，大半是侥幸的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、冒险性和偶然性。不幸的是，侥幸成功，非但没有使杨智玉认真思索那些潜在的不利因素，提高一点“见识”，从而谨慎从事，反倒使他胆子越来越大，以致到了“妄为”的地步，仅隔半月，又第二次去深圳贩鸭。结果，那些潜在的不利因素出来作难，成了导致他破产的直接原因。

“热”多于“冷”

时下，中国人的趋“热”风颇盛。不要说城里人以往的出国热、旅游热、购买进口小汽车热，单是乡下人搞商品经济，就有许多的“热”。什么“长毛兔”热、“蜗牛”热、“康贝尔”热、山楂热、猕猴桃热，等等。有人乘“热”而兴，

有人却因“热”而废。

发展商品经济，趋“热”并不都是坏事。但在“热”之前，必须先“冷”一下。“冷”什么？清原县一位在流通领域闯荡多年且积累了一些经验的农民说，至少要“冷”三条：一要看那个“热”值不值得赶，即能否有较大的盈利；二要看自己有没有条件赶那个“热”，比如胆识、资金、科学文化知识、市场信息等条件是否具备；三要看卷进“热”浪之后，能不能保持冷静头脑，在“热”极将衰之时，及时地退出来。有此三“冷”，其“热”可趋；无此三“冷”，其“热”当避。

杨智玉为什么趋“热”触了霉头？问题正出在他“热”得过火，“冷”得不够。从当时的市场行情看，“狄高”鸭价格确是看热，值得一“趋”。这一点，杨智玉是做了“冷”的判断的。但他并不具备趋“热”的条件。资金不足；没有鸭舍、饲料；身居穷乡僻壤，信息不灵；清原与深圳，千里遥遥，运输困难。他没有冷静地考虑这些，便盲目地卷进“热”流。侥幸得手之后，“热”得一发不可收拾，仅隔半月，又第二次去深圳贩鸭。“智玉，市场上的鸭价看跌，你还是不要去冒险了。”县畜牧局的同志好言相劝。杨智玉摆弄着手里的计算器，自信地说：“我冷静地想过了，即使鸭价跌下来一半，从一百二十元一只降到六十元一只，除去成本三十元，我一只鸭子还赚三十元呢！”由于头脑过“热”，他虽然能够冷静地对鸭价行情作出一般性的分析，但对鸭价行情将出现的特殊的、急剧的变化，却未能作出“冷”的预测。他不但没听劝告，在鸭价“热”极将衰之时，及时地从“热”浪中退下来，反倒一“热”再“热”，竟又拍电报催

请增加贷款三万元，将购鸭数从原来的一千五百只，增加到三千只！

正当他信心十足地联系往回运鸭之时，第一次运鸭时那些潜在的不利因素出来“挡驾”了。飞机不再承揽运鸭业务，他东奔西跑，左冲右突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连飞机的屁股也没摸着。无奈，只好去联系火车。运货的人多，车皮却奇缺，运鸭得排队，最快也得两三个月才能排到。无计可施之中，他突然想出个点子，赶紧跑到特区报社，拿出宣传过他从深圳用飞机万里运鸭事迹的报纸：“请支持一下吧！”这一招，果然奏效，特区报的同志热心为他奔走。火车虽然联系成了，但三千只“狄高”鸭运到家，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此时，市场鸭价行情发生了急剧、特殊的变化，鸭价一跌再跌，最后一百二十元一只的鸭子，连几元钱一只都卖不出去了。杨智玉“热”极而悲，闹得一败涂地。

有“一”无“二”

有人说，杨智玉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个人小算盘，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很有一点开拓精神的青年农民。此说有一定道理。别的不说，单是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，跳跃到商品经济领域这一点，就很可以反映出当代农民的进取精神。用飞机运鸭子，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，展示了新一代农民的胆识。但是，杨智玉又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开拓者。他往往只想到成功，只想到一往无前，只想到一帆风顺，对可能出现的失败和暂时、必要的退却以及始料不及的困难，则大大的忽略了。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，常常给一些开拓

者和他们的事业，带来致命的伤害。

当三架军用直升飞机载着杨智玉和五百多只“狄高”鸭，欢唱着在杨智玉家乡上空盘旋，两千多乡亲翘首瞩目之时，邻村的一位姓宋的青年农民发了一通议论：“我们能‘卖’上三个‘呆’儿：一、飞机降落的‘呆儿’；二、杨智玉发财的‘呆’儿，三、杨智玉上吊的‘呆’儿。”杨智玉听到这番话后，大笑连声：“笑话、笑话，我杨智玉怎么会自杀呢？失败不属于我！”然而，那姓宋的农民不幸而言中了。当杨智玉自信必定成功之时，失败猝然而至，他无论从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没有做好迎接失败的准备，先是惊慌，后是颓唐，继之是彻底的绝望。假若他在成功之时，也想到失败，那么他就会做好迎接乃至战胜失败的准备，结局就将大不一样了。他首次贩鸭致富，一些有见识的人曾劝他“见好就收”，退下来，看看市场行情再说。但他思“进”心切，哪里肯退半步？结果“一往无前”地撞在了“鸭价大跌”的“枪”口上，闹得一蹶不振。那时，他家乡的一些农民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优势，从事人参种植，前景乐观，有的已成了“万元户”、“十万元户”。更何况那时“狄高”热趋冷的势头已见端倪，倘若他能冷静分析形势，及时退下来，掉转船头，去搞人参种植，那他就不致陷进破产的泥沼了。杨智玉租用飞机运鸭，得到广州民航和沈阳空军的全力支持和悉心照料。缺东西给东西，缺钱借给钱，运费优惠。事事顺利使他陶醉在一帆风顺之中，对困难想的很少。当他把第二次运鸭也同样想得很顺利时，困难来了。飞机不再承揽运鸭业务，联系火车，一等就是几十天，等他把鸭子运回来，“财神爷”已经告退，等待他的却是破产的恶魔。假若他当初不

仅仅想到顺利方面，也把这些困难估计到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，那“财神爷”也许不会匆匆和他告别的。

杨智玉有句“口头禅”：“不干则罢，要干就破釜沉舟，不当百万富翁，就一死了之。”不当富翁，即为鬼魅，舍此别无他路。典型的形而上学。人世间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，怎么能有“一”无“二”，只要成功，不想失败，只讲进，不讲退，只想顺利，不想困难，搞那个砂锅捣蒜——一锤子买卖呢！

“我”大 于 法

一个僻远山沟里长大的青年农民，以重金租用飞机运鸭且赚了大钱，使人们领略了一代新农民的风采。然而，正当杨智玉名噪省内、国中，成为县劳动模范时，人们却发现，他的这一“惊天动地”的壮举，却是违法的。一、无证经营。说是运鸭，实则贩鸭。贩鸭应先办“贩运户营业执照”，而他却没有办理。二、指空卖空。他家里只有百多只“狄高”鸭，一无种雏、二无种蛋；他却和人家签订了一百多份预售种雏、种蛋的合同。以收取的数万定金贩回五百余只“狄高”鸭，转手倒卖，不啻一个小小的“皮包”商。只是念及他动用飞机贩鸭在全国引起的积极影响，加之初犯，有关部门才宽厚地给了他一个口头警告，没有依法追究他任何责任。

违法经营，助长了杨智玉的投机性和冒险性。他签定的一百多份预售种蛋、种雏、种鸭的合同，除少部经过公证外，大部未经公证。少部经过公证的合同，因怕露了“无证经营”、“指空卖空”的马脚，被取消经营资格，而没敢到

“经济仲裁委员会”去作“鉴证”。这样，杨智玉的一百多份预售合同，均未得到法律的认可。他没把法律放在眼里，法律自然难以对他预售合同的履行，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护。据杨智玉“遗书”所列，杨死前共欠债二万七千九百二十五元，别人欠他的共二万九千零八十八元。照说，两项相抵，杨还剩一千余元，是不致破产的。但他的欠债，大部份是贷款，受法律保护，必须偿还。而别人欠他的款项，都是个人按预售合同应付的买鸭钱。由于这些合同全是“君子协议”没有法律效力，因而难以索还。当初，杨智玉要是依法经营，依法签订合同，就不会处此窘境了。

杨智玉曾试图以个人的努力去追还欠款。但均未如愿。吉林省永吉县一养鸭专业户，欠杨智玉买鸭款一万多元。但欠债人因拉电网养鸭，电死了人，被逮进大狱，杨智玉催要无门，空手而返。吉林省盘石县一养鸭专业户欠杨智玉买鸭款三千元。但欠债人突然病故，抛下病妻和一双幼小的儿女，甚是可怜。欠债人的妻子欲破产还债，杨智玉思之再三，动了恻隐之心。那女人家流着热泪一揖再揖。杨智玉眼里闪着泪花：“破产还债，你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得下去，可着我一个人来吧，我年轻，还有东山再起的日子。”杨智玉一边索债不成，一边债台高筑，仰天叹息，悔不当初。他在“遗书”里恨悔交加地写道：“……虽说外面欠我的钱款是够抵债的，但就连经公证的债务至今都无能力收回，可见其余我就更难收缴啦，只有一死……”清原县法院和工商局的同志说：“他若早把法律放在眼里，哪会有这样的一天呢？”